



国企改革要在机制创新上下功夫

——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将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加快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两会期间，记者就国企改革中的重点难点、混合所有制改革如何推动国资国企改革以及弘扬企业家精神等问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

解决“一股独大”是混改关键

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有企业要通过改革创新，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国投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有哪些经验？下一步国企改革将如何推动？

王会生：改革开放40年来，国企改革一直被认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改革到现在，应该说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最近5年，分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定位更加准确、方向更加明确。国投总结的经验就是“四试一加强”：“一加强”就是加强党的建设，“四试”就是试方向、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调整业务结构；试机制，推行分类授权，激发子公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试管理，重塑总

部职能，形成“小总部、大产业”的格局；试监督，无论怎么改，国有企业不能乱，要构建国有资本监督的“闭环”。

至于下一步怎么改，我认为要用更大勇气和智慧继续在股权结构和机制创新上下功夫。从内部来讲，要把握好市场机制和企业活力两个方面，每个国企应根据自身特点，建立起一套适应市场的新机制，来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从外部来讲，建议政策上要建立容错机制，让企业家放开手脚。

记者：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您认为混改中该如何形成多元化股权结构制衡机制，提升混改的深度和质量？

王会生：混改难、混改推不动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一股独大”问题。如果引入的股东小、散，股权结构不能形成良性的内部制衡，就没法激发企业发展的活力。我认为，改制的企业要突破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的障碍。国企可以作为第一大股东，但不能绝对控股。这样既保证了国有企业的地位，同时也可以

让合作伙伴放心，共同为大家的利益和目标一起发力。所以我认为，混改要适当提高民营企业持股比例，增强民营资本参与混改的积极性。此外，混改不是“一混就灵”，我建议要建立容错机制，创新包容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企业家放开手脚。

东北国企改革要借鉴他人也要符合实际

记者：国有企业是东北振兴的重要力量，也是东北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东北地区的国企改革是不是更复杂一些？作为东北人，您对东北地区的国企改革有何建议？

王会生：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有自身客观条件的约束，比如，大部分是钢铁、石化、煤炭等传统行业，目前处于去产能阶段，推动改革相对困难。另外，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需要实力相对强、能够起到关键作用的民营企业，但东北地区社会资本和民企发展相对欠缺。我认为，东北的国有企业要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能百分百

复制、套用其它地区改革成功的案例，既要借鉴他人，又要符合自身实际，同时更重要的还是转变观念。

记者：去年9月，中央发文提出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请问您如何理解国企中的企业家精神？

王会生：在国企改革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中央出台文件提出激发和保护国有企业家精神，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国企的企业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企业家，也不同于民营企业。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很清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必须做到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我认为国有企业家要更加注重担当和创新精神，要想办法与市场机制相融合，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的规律。

对于国有企业家，在充分信任的同时要加强监督。加大监督改革力度，确保授权到哪，监督到哪，打破国企改革面临的“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

两会之声

一把手当起了重大改革“施工队长”

——访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赋

□ 本报记者 雷茂盛 梅超 雷云锋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重庆作为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将如何深入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提出的“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的要求？3月6日，在重庆代表团的媒体开放日活动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秘书长、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赋接受了记者采访。

王赋介绍说，去年7月30日，新一届市委召开了第一次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会上针对重庆改革提出了16个字要求：“对标对表、亲力亲为、敢作敢为、善作善成。”这既是要求，也是重庆改革的生动实践。

王赋对16字诀实施的进展情况一一进行了介绍。

“对标对表中央各项改革部署，我们有三本台账。”王赋说，一本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历次全会明确的重大改革举措，一本是重庆承担的国家层面改革试点，一本是中央出台的相关改革文件。各级改革干部都要定期对账，跑表计时，确保不漏项、不跑偏、不走样。

据王赋介绍，重庆各级一把手都亲力亲为。陈敏尔书记担当了重庆许多重大改革的“施工队长”，亲自拿“工具”、亲自上“工地”。许多重大改革，书记亲自部署，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还要亲自过问。

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注重地方实际

——访全国政协委员、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正国

□ 本报记者 李凌晨

3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讲话，在代表和委员中引起热烈反响。全国政协委员、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正国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进一步明确了路径和方向。他认为，结合实际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已成为当务之急。

针对乡村振兴战略制订问题，李正国从多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规划要充分考虑到城镇化趋势变化。各地须先把地方各方面情况调查清楚，做到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在制订规划过程中，要借鉴城镇化发展经验，严格遵循人口迁徙带来的城镇化趋势变化这一客观规律。把乡村振兴战略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尤其要把乡村振兴战略与城镇化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衔接，融为一体，做到城乡融合、城乡一体。

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时，要尽量避免把重大工业项目布局到乡村。工业项目都有比较严格的环保要求，如果在乡村布局重大产业特别是重大工业项目，将大大增加环保成本。在广大乡村应主要布局以种、养殖业，旅游业，以及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加工业、服务业等。

制定乡村振兴规划，要特别注意避

免在偏远农村的空壳村布局村民聚居点。政府对农村的萧条和空心化，因顺势而为，因情而定，在偏远农村的空壳村布局村民聚居点的问题上应慎重决策。因为一旦布局聚居点，就必须解决一系列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等资源配置问题，且极易产生循环性巨大投入，若干年后仍有可能是空壳村。

李正国建议，在制定乡村振兴规划时对不同村落区别对待。对于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只是由于交通的不便或者与城镇生活差距较大而成为空壳村，政府要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发展以教育为主的农村社会事业，完善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加快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鼓励通过加大土地流转力度，扩大经营规模，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之路，使土地更好地发挥作用；可以变空为宝，发展乡村旅游业等。

对于放弃布局聚居点的村落，政府也不能不管不问，而是要更加下大力气继续为留守家庭的老人和儿童提供生活、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兜底保障，使他们也能较好地生活；对于有搬迁愿望的村民，政府应该加大易地扶贫搬迁的力度，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引导帮助青壮年到城镇就业，使他们逐步在城镇居住下来。与此同时，对放弃布局的村落，可以作为退耕还林地保护，恢复山林生态。这样既可以减少大量的公益设施投入，大大减少其维护、运行、管理成本，又保住了绿水青山，留住了金山银山。

基础研究是科技强国的基石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

电影《厉害了，我的国》近期热播，引发国人关注和赞叹。在电影中，桥、水、陆、港等一大批基础建设工程，处处都有科技创新的影子。蛟龙、悟空、天眼、墨子、慧眼、大飞机……近年来，一批批代表性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相继涌现，我国的科技实力正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同时，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而科技创新领域仍有很多问题亟待破解。为此，记者就基础研究以及人才激励等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

基础研究强才能科技强

记者：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在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关口下，您认为基础研究应如何发展？

杨卫：我认为，科技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而基础研究则是实现科技强国的基石。所谓科技强国，不仅是根据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在技术方面有所突破。还必须依赖更高层次的创新——源头式创新，也就是从基础研究衍

生出来的、拥有完全主动权的科学突破。从供需角度看，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所以说，基础研究强才能科技强，科技强才能国家强。

同时，基础研究有其自身特点。一是人才换代周期长。基础研究的核心永远是人才，但需要有耐心，不能拔苗助长。二是链条长。从基础研究到取得成果，再到技术上突破和市场应用，这个周期也很长，所以短期的绩效评估是无法评价基础研究的。三是探索性强。很难通过简单的计划、规划来解决。所以对基础研究而言，稳定的、不断加强的、长期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人才政策仍需妥善梳理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您能否谈谈我国在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现状如何？又存在哪些问题？

杨卫：近年来，我国在科技人才队伍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回国等方面采取了很多举措。但是，在人才计划的实施和具体的人才政策上依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首先是各种人才计划繁多、重叠，相似度太高、区别度不够。其次是在各高校与研究所的人事改革中，过度强调了与人才称号的关联，把人才冠以不同帽子，并以此区别对待。除此之外，还存在与薪酬体系过度挂钩，高校“双一流”建设异化为“争人”，有的单位开始出现人才层级化等问题。

记者：对于这些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杨卫：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科教人才政策进行妥善梳理。谨慎出台新的人才计划，及时终止效果不佳的人才计划，避免人才计划的执行期重叠。高校和科研院所不要将薪酬与人才计划过度挂钩，杜绝人才的层级化。同时，在人才评审中，应分类梳理人才帽子，适度考虑地域差别，对落后地区进行适度倾斜。鼓励人才正常流动，通过建立平台，在大数据的辅助下，不断调整各地区、各行业、各学科的人才政策。

记者：科技评价体系一直以来受到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也是大家讨论的热点话题。您认为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应如何建设？

杨卫：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评价体系本身是一篇大文章。我

们现在的评价体系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主观评价，就是由专家来进行评价。二是客观评价，根据客观反映的数据，比如，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来进行评价。我们讲，学者对科研项目或论文稿件的评审一般为客观评价，而对于职称评审往往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这两种评审都有其优缺点，客观评价的缺陷就是“数豆子”，将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计算成分数来计算，而一些科研，比如基础研究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成果。主观评价的缺点就是评审专家会有人情或学术倾向性的问题出现。

两种评价模式都有其各自问题，所以在操作层面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比如，基于客观数据的主观评价，专家充分了解客观数据后按照自己的学术价值观进行评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目前多采用这种“学术共识型”的方式。还有在多方面专家对指标体系达成共识后由数据系统完成的客观评价，比如，在“双一流”大学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评选中，先由专家投票选出遴选“双一流”的指标体系，然后对参选学校按照这一体系来进行评价。

(均为本报记者王岩采访)

两会会议表情



(一)



(二)



(三)



(四)



(五)

3月14日上午，全国人大各代表团认真审议监察法草案。一大早，四川代表团刘旭光和罗强早早来到会场(一)。江苏代表团戴源发言(二)。四川代表团肖有才发言(三)。江苏代表团韩立明发言(四)。四川代表团刘强发言(五)。

本报记者 高弘杰 摄